

风暴来临之前

直言激怒当权领导

我成了肃反的审查重点

半年的隔离生活

一句话的小组会

回国后埋头写小说

反右的利刃悬到头上

不得不“低头认罪”

搞不单打“亲人”连累不幸

进入劳教农场

文艺部的生活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中

右派分子当了人民教师

慈母的眼泪

女儿相见不相识

工作问题受挫，写出小说不能出版

无权参加“文化大革命”

盐场

二十三年之后重返家乡

上访

沉痛悼念人民的好总理

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工作问题困难重重

重操旧业、离休和发挥余热

直言无悔

我的“右派”经历

徐孔◎著 ◎

新华出版社



直言無悔

我的“右派”经历



徐孔◎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徐孔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011-9350-9

I. ①直… II. ①徐…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0184 号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作 者：徐 孔

责任编辑：张 程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7.5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9350-9

定 价：29.80 元

温馨提示：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13651277005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3969

目 录

CONTENTS

- 一 风暴来临之前 (1)
- 二 直言激怒当权领导 (6)
- 三 我成了肃反的审查重点 (13)
- 四 半年的隔离生活 (27)
- 五 一句话的小组会 (33)
- 六 回国后埋头写小说 (49)
- 七 反右的利剑悬到头上 (57)
- 八 不得不“低头认罪” (69)
- 九 祸不单行，亲人连遭不幸 (77)
- 十 进入劳教农场 (91)
- 十一 文艺组的生活 (101)
- 十二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中 (108)

- 十三 右派分子当了人民教师 (119)
- 十四 慈母的眼泪 (128)
- 十五 女儿相见不相识 (137)
- 十六 工作问题受挫，写出小说不能出版 (154)
- 十七 无权参加“文化大革命” (162)
- 十八 劳改盐场 (183)
- 十九 阔别三十三年之后重返家乡 (191)
- 二十 托钵上访 (217)
- 二十一 沉痛悼念人民的好总理 (242)
- 二十二 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工作问题困难重重 (252)
- 二十三 重操旧业、离休和发挥余热 (261)
- 二十四 暮年的反思 (268)

一、风暴来临之前

1955年7月中旬，我从朝鲜回国休假。

这是朝鲜停战后，我第二次回国休假。

第一次是1953年10月，朝鲜停战不久，我的工作有所变动。战争期间，我是志愿军二十兵团（朝鲜东线）新华社记者组的前线记者。我这个记者是双重身份：业务上由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领导，编制却属于二十兵团。停战后，兵团领导认为报道的任务少了，决定让我改做编辑工作。兵团政治部办了个机关刊物《工作通讯》，需要加强编辑力量。接手新工作之前，允许我回国看看，假期很短，只有半个月。我连东北老家也没回，从朝鲜直接回到北京，住在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老同学黎白的家里。我想利用短暂的假期和老同学商量一下写作计划。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深，很多人和事，一想起来就激动不已，无法忘怀，我很想写一部长篇小说。黎白给我腾出一间房，我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拟了一个写作大纲，又向黎白和另外一个同学——在作家协会工作的李兴华谈了我准备写的几个大的战役、主要矛盾发展脉络和主要人物。他们认为大体可以，反正一部长篇小说，很难按原计划写到底，随着矛盾的发展，人物和情节都会有新的变化，先动笔再说。

这个假期，我主要是住在黎白的家里考虑写作的事，只会过几个联大的老同学和军队的老朋友。当时，我父母在北京我妹妹家里，也只见过两次，假期就完了。

回到朝鲜不久，主编兵团机关刊物《工作通讯》的编辑科长秦江调回国内，到总政治部八一杂志社工作，我接任《工作通讯》主编。手下只有一个编辑、一个见习编辑，编辑部下边有一个小型印刷厂，我从组稿、编稿、审稿到印刷，事事都要亲自抓，忙得不亦乐乎，根本无暇顾及写作，很想换一个工作，能有一点自己支配的业余时间。可好，1955年春，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调令，调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徐逸人和我到刚创办的《解放军报》工作。我非常高兴，到了那种大单位，不论做编辑、做记者，都可以有一点自己支配的时间。可是兵团政治部不放我，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找我谈话，说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我的工作，所以便不能放我走。他说，这是工作需要，虽然前线的工作、生活条件不如国内，但考虑到我年轻、身体好，组织上让我在前线多工作一段时间，相信我不会不同意。那时候，我思想非常单纯，无条件服从党的安排，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于是，宣传部副部长徐逸人回国去了，我继续留在兵团编机关刊物《工作通讯》。

1955年，志愿军已大部分撤离朝鲜。6月，《工作通讯》停刊，下属的印刷厂人员回国，宣传部编辑科和宣传科合并，我的工作又一次发生了变动，在接手新工作之前，我又一次提出回国休假的申请。政治部丁莱夫副主任很痛快地答应了，并在我临走的时候对我说：“在兵团的干部里，你在朝鲜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这次回去可以多休息一段时间。前两天政治部有人回国我已向他交代，回军区替你安排一下，愿意住哪个招待所都可以，如果想

结婚，不必给兵团写报告，通过回国的兵团的孙部长，就地在军区办个手续就行了。”



1952年秋在朝鲜前线的战友合影。左起，前排作者、王宇，后排李黎、徐光耀、秦江。

回国以后，我没有住军区招待所，因为我在军区机关没有什么熟人。1948年，我和徐光耀一起从联大文艺学院创作组调出来，就到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杨成武兵团做新华分社的随军记者。1950年由兵团调到北京军区，做新华社驻军区报道组的记者。不久，兵团赴朝，我又回到兵团。在军区时间只有几个月，而且我的任务主要是下部队采访，和军区机关各单位接触不多，熟人很少。我熟悉的主要是兵团和联大文艺学院在京工作的一些人。这些熟人对我这个从朝鲜前线回来的人非常热情。在作

家协会工作的文学系同学李兴华在作协招待所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那里很安静，写作或找一些老同学商量写作的事情都比较方便。

因为这次领导对假期没有限定，时间比较宽松。所以我对自己的日程的安排也就比较宽松。安顿好住处以后，首先处理了些个人的事情。当时我爱人徐宝珍正住在北京她朋友的家里。她是兵团文工队戏剧队的演员。经兵团政治部批准，两个月前她和政治部的两个年轻人一起回国考大学。现在考试已经完毕，正等候考试结果的通知。她提出，利用等候通知的这个时间，回福建看看母亲和弟弟。1949年，她13岁就参了军，到四野南下的54军文工团当了一名小团员，随部队南下两广，以后又随军赴朝作战，其间一直没有回过家。家里很困难，她6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姐姐已经出嫁，哥哥在解放后参了军，家里只有母亲和弟弟，全靠母亲打工维持生活。她想回去尽可能地安排一下母亲和弟弟的生活。结婚的事等大学考试结果公布以后再决定。我觉得这是做女儿应尽的孝道，帮她筹措了一些路费。送走她以后，我开始看望先我回国的兵团的一些老朋友：在解放军报社工作的原宣传部副部长徐逸人、在八一杂志社工作的原编辑科长秦江以及王宇、曹振峰、高焰和宣传部两个年轻同志何乃庄、何秀敏等，还有联大的几个老同学：黎白、陈森、周普文等。战争年代结下的友谊是纯真的、深厚的，彼此相见，都是真情的交流，要说的事情很多很多。这一走动又是十几天过去了。我在招待所里坐下来开始写作以后，仍然不时有熟人来看望，一聊就是几个小时。那年夏天酷暑难当，那时的条件不比现在，房间里不但没有空调，连电风扇也没有，写不了一会儿，就大汗淋漓，进度很慢。刚写了两章，就接到军区转来的兵团的来信，大意是：兵团的肃

一、风暴来临之前

反运动已经开始，如果你已办理结婚手续，可以再休息一段时间；如果尚未办理，望立即返回参加肃反运动。

我那时政治热情非常高，对党的号召绝对是勇往直前的。我爱人探亲尚未归来，我怎么能住在北京等着结婚而置身于这场敌我斗争之外？我毫不犹豫地给爱人留下一封信，说明情况，立即动身回朝鲜。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满怀激情地回去参加肃反斗争，自己却成了肃反对象。

二、直言激怒当权领导

当时，朝鲜停战已经两年，后方的交通条件好多了。从北京经丹东到朝鲜西部新安州都是坐火车。从新安州到兵团部驻地龙烟浦里（村）有兵团部的班车，整个旅程只用了两天的时间。

龙烟浦里是朝鲜西部的浅山区。兵团部驻地在龙烟浦里以南、矮山梁西坡的两道沟岔里，司令部和直政处在南边沟岔，政治部在北边的沟岔。当时部队还没有修建永久性的营房，各单位居住和办公都是在坡脚处修建的半掘开式掩蔽部或用树枝篱笆两面抹泥做墙，茅草盖顶的简易房。我的住所是两开间的半掘开式掩蔽部，里边小间是我的宿舍，外边大间是原《工作通讯》编辑部办公室。

我回到住所，最先见到的是原编辑部的郭游和杨平。郭游很瘦弱，个子不高，可是火气很大，直筒子脾气，说话不管不顾。我向他们两个了解运动的进展情况。郭游说：“志愿军里哪来的反革命？大嚷大叫的火力倒挺猛，全是没有目标乱开枪。”我深知这老兄的脾气，他在三反运动中受过一些委屈，可能对政治运动有些抵触情绪。杨平这个年轻的见习编辑和郭游正相反，高大魁伟，赤红脸，浓眉大眼，从外形看是个标准年轻军人，可是他的性格却老实到有点窝囊的地步，上眼皮总是下垂着，一说话就

脸红，是宣传部有名的老蔫。他只是红着脸笑，并不说话。

正在郭游高声大调地申明他的见地的时候，宣传科的助理员张山跑来了，一进门就紧紧握住我的手，不停地摇着说：“刚听说你回来了，怎么不多休息一些时间！”我说：“接到兵团的信，叫我尽快回来参加运动。”他说：“是啊，是啊，运动一开始，工作更忙不过来了，你再不回来我真有些吃不消了。”论关系，我和张山是前后同学。他是1944年从敌战区北平出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华北联大学习的，我是1945年入华北联大的。他从联大政治班毕业以后就到部队搞宣传工作，有经验，笔头子也快。宣传科另两个助理员丁海和何秀敏都是年轻人，经验少，文字功底也差一些。宣传科长刘鸿飞原是县大队政委，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宣传科起草文件、编写教材等重要的文字工作主要靠张山。运动一来工作时间少了，一个人更忙不过来了，我回来可以分担一些他的工作。张山又热情地问我爱人考学的情况和几个熟人的情况，但没有提到原副部长徐逸人。这两个人性格作风截然不同，工作关系也不融洽。张山走后，我马上到宣传部长韩福贤那里销假。

韩福贤原来是政治部民运部长，在徐逸人回国以前就调到宣传部来了。徐逸人和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的关系一直不好，下边议论：丁主任是为了“改善”宣传部的领导，把不懂宣传业务但听话的民运部长调到宣传部来做徐逸人的顶头上司。在当时的部长里边，韩福贤的年纪较大，四十四五岁了，又高又胖，据说有“寒腿”的毛病，大热的夏天腿上也包着护膝。

我向韩福贤简单汇报回国休假的情况以后，韩福贤没有问我一句私事，就像在部务会上讲话一样，郑重地对我说肃清反革命分子是纯洁我们的队伍，巩固革命政权的必需的重大的战略任

务，每个党员干部都必须全心全意地积极地参加运动。又把兵团党委对运动的部署、要求和运动期间的纪律等作了一番交代，最后说现在是运动第一，日常的工作由张山向你交代。

当时，我的情绪很高。参加革命以后，历次运动——土改、三查、三反，我都是积极分子。我觉得，正像韩部长传达的那样，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内外的敌人千方百计地想颠覆年轻的革命政权，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反革命分子，对纯洁革命队伍，巩固革命政权确实是十分必要的。我决心全身心地投入肃反运动。

可是我第一次参加宣传部的小组会，就发生了使我感到十分不正常的现象，导致了我和韩部长的正面冲突。

那一次小组会是在宣传部的办公室召开的。参加小组会的有宣传科、文化科和电影放映队的全部人员。主持小组会的是张山，韩部长也参加了。

小组会主要是要大家揭发问题，发言并不踊跃，揭出来的也都是些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因为没有什么有根有据的重要问题，会场的情绪并不热烈。不料，小组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出现了爆炸式的场面。

“爆炸”是由电影队一个年轻队员小马的发言引起的。小马揭发张山背地里讲丁主任的坏话，说听丁主任作报告是活受罪，尽说车轱辘话，反反复复、啰哩啰唆，简直是对听报告的人的一种精神折磨。

其实，政治部一些年轻干部背地里议论领导——包括丁莱夫副主任工作、生活上缺点的人，并非稀有现象，而且小马揭发张山的问题，在肃反运动中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不料，坐在张山旁边的韩部长突然站起，把手上的记录本往桌子上一摔，红头涨脸地冲小马说，这都是“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挑唆的，徐逸人成心

破坏领导和干部的关系。

韩部长这爆发式的一声吼，揭发张山问题却没来由的给原来的副部长徐逸人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大帽子，使大家一时都怔住了。过了一会儿，就有几个曾对徐逸人有意见的人，纷纷揭发“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的“罪行”。诸如：徐逸人态度粗暴，给他汇报工作的时候，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几次找文工团女团员打麻将，影响恶劣等等，虽然都是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但都提高到反革命活动的高度。

韩部长这爆发式的一声吼，虽然师出无名，但引导效果是明显的，我越想越觉得情况不正常。小马在会上揭发张山的不过是背地里议论领导的“怪话”，韩部长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而且把枪口转向了徐逸人？是为了保护张山免受群众的冲击？不是没有可能，张山一直是韩部长跟前的“红人”。张山这人我了解，他并非没有主见、人云亦云的人。他对韩部长的领导也有很多意见，而且语言尖刻，在下边讲韩部长的怪话比别人还“精彩”。但在韩部长面前绝对是谦恭的，韩部长向他布置工作时，尽管有些地方他不同意，但从不提出异议，总是严肃虔诚地点着头，好像他已完全领会，并将坚决执行。所以韩部长一直把张山看成听话的、得力的干部。为了保护张山及时转移群众的“火力”，不是没有可能。问题是，为什么把枪口转向了徐逸人，而且戴了那么大的帽子？

徐逸人这个人，在副部长当中比较年轻，恃才傲物，对上对下的关系都不大好，尤其是对上，比如与丁莱夫副主任时常发生碰撞。但像韩部长那样的老同志总应该知道，“反革命分子”是敌人，这顶帽子是不能随便扣的。特别是作为运动的领导人，更不能无根据地给人乱扣帽子，否则，就容易形成对运动的误导。

韩部长那一声吼以后，不少人跟着“反革命分子”徐逸人长，“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短地乱喊叫，明显地是走火了。

当时我是政治部党支部的宣传委员，觉得应该向韩部长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我一想到给韩部长提意见，心里就有些发憊。虽然韩部长来到宣传部的时间不长，但不多的几次接触和过去在韩部长身边工作的人所说的情况，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韩部长这个人对上、对下是两副面孔。我这人说话做事一向直来直去，最怕和这种人打交道，可按组织程序，反映对宣传部运动情况的意见又不能绕过韩部长。

不管能不能接受我的意见，还是要说。

晚饭以后，酷暑难消。韩部长拿着一把蒲扇，坐在宣传部办公室旁边一棵大树下乘凉。宣传部办公室在我住所的对面。我来到韩部长身边，说：“部长，我想对今天的小组会提点意见。”

韩部长冷冷地看着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运动刚刚开始，如果没有什么证据就说徐逸人是‘反革命分子’恐怕不妥当，特别是你作为运动的领导人，首先给徐逸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更不合适，容易对运动产生误导。”

韩部长的脸色突然变了，厉声问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我也火了，反问：“你是部长，你说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他又问我为什么替徐逸人讲话。

我说：“我不是替徐逸人讲话，我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必要。我是对你和几个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提意见。这次运动是肃清反革命，不能把同志关系和工作、作风问题混淆成敌我问题。”

韩部长说现在还没有给徐逸人做结论，还没有定性他是反革命分子。

我说：“韩部长，你和几个人喊出来的可是清清楚楚‘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既然没做结论，为什么给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韩部长反问我，徐逸人的言行是革命的吗？

我说：“是否是反革命分子是个组织问题，必须有证据，单凭今天大家揭发的那些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能给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吗？”

韩部长语塞，狠狠地一挥蒲扇，让我不用管运动中的事，还让我好好想想，准备交代自己的问题。和我预感的一样，这次说话不欢而散。

第二天的小组会，韩部长一反以往的惯例，不是先听大家发言，而是自己第一个发言，拖长声调说，有的人刚一回来，就对开展运动的情况横加指责，指责宣传部揭发徐逸人的问题是混淆矛盾。小组会并没有给徐逸人定性，是揭发徐逸人有害于革命的言行。有的人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低估群众的觉悟，自己跳出来表演，那么就给他充分的条件让他表演，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韩部长的话刚说完，就有人喊着要替反革命分子徐逸人当保镖的人站起来。

我心里非常火，韩部长这明明又是在引导，不过是把枪口转向我。徐逸人在国内，在朝鲜无法整徐逸人，就找我当替身。可能以为我和徐逸人关系较密切，整我就可以抓到徐逸人的某些东西。我和徐逸人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于是我就坦然地说：“是我向韩部长提过意见。”我当然没有站起来，只是如实地

把我参加小组会后的想法和向韩部长提过的意见详细地说了一遍。

我说明情况以后，多数人没有说话，但有一个人猛地站起来，怒冲冲地质问我为什么对领导的号召打横枪，还要我老实交代和徐逸人的关系。

这一来，进攻的焦点就点明了。接下来，就有几个人要我交代和徐逸人的关系，揭发徐逸人的反革命言行。第二天的小组会也是如此。

当然都没有什么“战果”，以后改换内容，要我交代历史问题，包括我的家庭情况、从伪满到北平读书的情况、日本投降以后从北平到解放区的情况等等。提的问题不少，但这一次的小组会火力并不猛烈，我如实回答以后，几乎没有再追问什么。因为我写的自传和各个时期的历史情况包括证明人，档案里都有，入党以前组织已做审查，没有可质疑的地方。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整我的目的不在这里。